

清末“江宁兴学”研究

都樾 王卫平

摘要：在清末教育改革之初，受刘坤一、张之洞委托，以缪荃孙、张謇、罗振玉为代表的东南士绅与江鄂负责学务的官员就如何兴办近代学校教育展开深入讨论，在江宁先后三次集议，对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材和兴学次第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积极推进建设以江宁为中心的示范性学校系统，这既标志着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启动，其间的兴学共识与争鸣又对清末学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末兴学；官绅集议；价值取向；兴学次第

在清末新政方兴未艾、学校教育创始肇端之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至二十八年（1902年）秋，受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以缪荃孙、张謇、罗振玉等为代表的士绅和以恩寿、吴重熹、施炳燮、黄绍箕为代表的江鄂官方人士先后集议，就如何兴办近代学校教育展开深入讨论，在新式教育的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兴办次第等方面产生意见分歧，并在激烈争辩之中，以江宁为示范中心探索创立各级各类学校，此一过程被时人称之为“江宁兴学”或“江宁兴学之议”。江宁兴学既标志着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启动，其间的议论与争鸣更对“湖北学制”的制定、“壬寅学制”的酝酿和“癸卯学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江宁兴学的背景

清末新政之初，清政府从“人才为政事之本”，¹“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²的政治要求出发，将改革科举、兴办学堂作为推行新政的既定国策和首要举措。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廷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着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飭，认真兴办”。³由此，在全国掀起学制改革和普兴学校的巨潮。应该说，在清末新政、兴学过程中，因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洋务事业引领风气、新知新学人才辈出，尤其戊戌政变后成为维新人士避难之所，庚子之乱时“东南互保”保持了社会稳定等等缘由，位处长江中下游的两湖、两江地域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育才兴学”而言，清末新政之前，在江苏和湖北、湖南出于培养洋务专门人才目的或顺应维新变法潮流的新式学堂渐次筹办，教育改革初露端倪，如江苏创建江南水师、陆师学堂，改革江宁储才学堂，筹办江南高等学堂、江宁农务学堂、上海工艺学堂；湖北仿照西洋学院改革两湖书院，创建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湖南创设南学会、开办时务学堂，等等。尤其是戊戌变法期间，响应光绪帝变更科举、谕令兴学之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会衔奏请“妥议科举新章”，请试时务策，专问西学、西政，不做时文

¹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5页。

²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页。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76页。

体。¹同时两江、两湖积极筹拟“广设学堂”，会商“学校等级”，筹划办学经费。而戊戌政变之后，面对清廷明令“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办学堂”的倒退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则冒着政治风险，大胆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进而建议清廷“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²并将筹办中的江南高等学堂改名为格致书院，留存学堂之实。这些举措为后来新政时期普兴学校奠定了思想基础，明确了舆论导向，提供了办学条件。为此，当新政之初，世人多目江鄂为导兴教育之帜，如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901年9月）沈曾植在《与盛宣怀书》中曾明确表示：“陕中政务、鄂中事务，议论定后，当取一二试行之。”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主推行“东南互保”，在客观上保持了长江以南的社会经济稳定，并在此体制下强化了江、鄂地方的政治影响和政治联结。由此，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01年4月），清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派督办政务大臣8人，总领新政事宜，外省督抚唯有刘、张二人“遥为参预”，凸显了江鄂地方在新政筹划中的政治地位。五、六月间，刘、张联衔奏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受到了清廷的充分重视，成为清末新政初期的改革纲领和蓝本，时论有云：“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⁴故“新政全采江鄂之说”。⁵同时，江楚会奏变法也进一步紧密了江鄂间的政治联姻。一方面，通过奏稿拟定前后数个月的函商、会议、推敲、磨合，以江鄂合作会商、达成共识的方式来推进新政实施的机制逐步明确，所谓“新政以江鄂为主”，“此唱彼和，势已融成一片”。⁶因此，在兴学问题上江鄂双方本意继续采用协商共举的方式，如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会派人员赴日本专题考察教育；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在江宁共设“江楚编译局”，编纂教科书，并翻译西方书籍报刊；九月，刘、张联名请军机处代奏“请颁毕业出生章程”并请科举“分场发榜”，藉此学校“民间自然集资兴办，不待官筹，最为善策”，⁷等等；另一方面，变法三折在草拟过程中征求、参考了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东南士绅中的新知人士，刘坤一“以变法之议电邀张季直（謇）、何梅生（嗣焜）、汤蛰先（寿潜）、沈子培（曾植）来宁代拟条陈”，⁸由张、沈、汤各拟一稿寄鄂；张之洞则邀请幕僚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以及学者劳乃宣协助起草，并邀请沈曾植、张謇和缪荃孙赴武昌“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⁹在兴办学堂“事属创始，时议纷纷”，

¹ 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5月第1版，第770页。

² 《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刘忠诚公（坤一）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影印版，第3999页。按：本文索引《刘忠诚公（坤一）遗集》资料，均来自同一出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

³ 《与盛宣怀书》（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许全胜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版，第256页。

⁴ 《扬州与南皮制军书》，《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51页。

⁵ 张佩纶：《复杨萍石观察》，《涧于集》书牋卷六，民国十五年涧于草堂刻本。

⁶ 张佩纶：《复陈弢庵阁部》，《涧于集》书牋卷六，民国十五年涧于草堂刻本。

⁷ 《致郑州行在军机处》，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227页。

⁸ 《复盛杏荪》，《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74页。

⁹ 《斋翁自订年谱》，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8），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1017页。武昌之行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记为五月事，《年谱》误为七月，据《艺风老人日记》核对，时在五月。

¹又“虑宗旨不一、程度不齐，易滋流弊”²的形势下，通过官绅集议筹商，“庶学制、教程可期画一，邪说讹行无自萌生”。³因此，在江鄂学堂“已办有端倪”且“粗具规模”的基础上，一面是刘、张各自行催司道、札委专员“妥速筹议详办”，一面则邀缪荃孙、张謇、罗振玉等在江宁共商办学宗旨、兴学次第、课程教材等问题。

缪荃孙、张謇、罗振玉是当时江鄂双方都十分信任乃至推崇的精英人才，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张之洞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时，三人之名皆列入其所举三十人之中。

缪荃孙（字筱珊，亦作“小山”，号艺风）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门下弟子，曾积极参与张之洞主持的学术活动，协助编撰过《书目问答》、《顺天府志》等。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后，在朝廷先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总纂。光绪二十年受权臣徐桐排挤，丁母忧，弃官离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回湖广本任前约缪氏次年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后兼领常州龙城书院。在江宁，缪荃孙的身份、地位特殊。一则，他执掌的钟山书院是清代江苏书院之首，创办最早、声誉最隆，前后担任山长的大多是海内知名学者。因而，精通文史、方志、金石、目录之学的缪氏也由是成为当时江宁乃至东南学界、文坛的领袖之一，地位尊隆。二则，他是张之洞在江宁布下的一个棋子，发挥着交通官府、了解舆情、联络士人的作用。所以，缪氏也成为历任两江总督，如刘坤一、魏光焘、周馥、端方等的座上宾，时而参与要政的谋划与决策。在谋划教育方面，光绪二十四年，江南高等学堂筹办之初，刘坤一任命蒯光典为总办，缪荃孙、张謇“以绅士预议”，⁴后来缪氏还担任江苏方面的学务稽查。⁵在张之洞的保荐名单中，缪荃孙名列第一，其考语为：“学问博雅，识趣端凝，讲才时务，不涉轻浮，其人品坚定，不染时俗躁竞之习，尤为可贵。”⁶

张謇（字季直）在光绪甲午大魁天下之后，丁忧返乡守制。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受委办理通海团练、筹办纱厂、兴办商务，并主持江宁文正书院。此后，通过成功举办大生纱厂，开办商局、商会，参与谋划“东南互保”，建言招安徐宝山，谋议新政变法折稿等，受到刘、张的赏识与信任，被引为智囊。同时，在建校兴学方面，光绪二十三年四月至五月，张謇赴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为恩师翁同龢草拟“大学堂办法”和“学堂奏”，并由管学大臣孙家鼐奏派为大学堂教习；九月起，他游说刘坤一等在江宁“试立明算小学堂”，⁷并草拟明算、方言两小学堂章程送呈，刘坤一“饬先领四千金为制备器具之用”⁸；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在江宁知府刘嘉树支持下，“假文正书院斋房设立明算小学堂”，额设学生十名，附从十名”，⁹“闻风兴起，愿留授业者竟多至一百数十人”¹⁰；四月，“又就文正书院内附设西学堂，造就人才，补储才学堂所不足”，¹¹“专教汉文、英文、翻译、算学”；¹²光绪二十七年

¹ 《复沈子培》，《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85页。

² 《致张野秋》，《张之洞全集》，第10308页。

³ 《照委王同愈充湖北学务处总办兼充两湖大学堂监督》，《张之洞全集》，第4186页。

⁴ 《致金武祥》（四十五），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2），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85页。

⁵ 《致端方》（三），《缪荃孙全集·诗文》（二），第380页。

⁶ 《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1518页。

⁷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434页。

⁸ 《复张季直》，《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110页。

⁹ 《钟山毓秀》，《申报》第9007号，第2页。

¹⁰ 《振兴算学》，《申报》第8994号，第2页。

¹¹ 《振兴时务》，《申报》第9063号，第2页。

¹² 《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张謇全集》（5），第5页。按，该章程应为1899年的修订章程，2012

二月，张謇撰《变法平议》，供江鄂拟制新政变法奏稿参酌，提出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学堂先学图画、译书分省设局、权设文部总裁、明定学生出生等关涉教育的系统性建议。对此，时人评论说：“至于汤蜚先、张季直诸人所拟章程更雄辩高谈、繁征博引，虽圣明采择与否尚未可知，而其新政之萌芽则已如雨后春苗，颇觉蓬蓬勃勃矣。”¹由此，张之洞将张謇列在保荐名单第二位，其考语为：“学问富赡，才力开张，讲求东西各国政治教育各门学术，均能心知其意，办事切实精密，洵为致用之才。”²

罗振玉（字叔蕴）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翌年设《农报》馆，翻译、出版东西洋农业书籍；光绪二十四年开办东文学社，教授日文、英文与数理化课程；光绪二十六年应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兼农学堂监督，在任上整顿校务，建教学试验场，由此“教员称便，校风清谧”；³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5月）创办中国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翻译刊载教育法规与教育书籍，发表对中国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和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议，产生广泛影响。罗氏因此声名大噪，沈曾植认为“罗叔蕴内外公推”，⁴而张謇曾向缪荃孙极力推荐，说：“浩吾外唯叔温于教育事极留心，极当行”。⁵罗振玉在张之洞保荐名单中列第二十位，其评语为：“学问优长，近年究心中外农学及教育学，广为搜采选辑流传，深裨世用，确系有用之才。”⁶

二、江宁兴学的商议过程

江宁兴学之议，张謇、罗振玉等当事人所指主要是光绪二十八年二月至三月间（1902年3月至4月）共集江宁与两江官方主管学务官员之间的学务讨论及产生的意见分歧，但从议学兴学的前后过程而言当向前推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江鄂筹拟新政奏稿之初，向后延至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张之洞奏呈《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官绅之间实际进行了三次集议。

（一）第一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到九月（11月），其主要内容是藉江鄂会议新政奏稿、统筹改革全局之机，明确育才兴学为图治之首务，并初步筹划兴学事宜。期间，二月，张謇、沈曾植在江宁分别为刘坤一草拟新政会奏底稿，均将“兴学堂”作为新政要旨之一。张謇主张“普兴学校”，建议用五年时间，“由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⁷健全学制体系。同时强调首先设小学堂和开设师范班。二月二十三日（4月11日），张謇谒见刘坤一，“第论州县以下官改职及学堂事”，并提出“变法须财与人，财不胜用也，行预算订税目而已。人不胜用也，设学堂行课吏而已。”⁸三月十四日（5月2日），张謇为辞文正书院山长事致函刘坤一，论及明算小学堂和各州县书院改

版《张謇全集》系年考订为1897年，有误。

¹ 《新政刍言》，《申报》第10094号，第1页。

² 《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1519页。

³ 罗振玉：《集蓼编》，第12页，《松贞老人遗稿》甲集，民国丛书第五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出版。

⁴ 《与盛宣怀书》（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3页。

⁵ 《致缪荃孙函》（六），《张謇全集》（3），第1651~1652页。

⁶ 《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并清单》，《张之洞全集》，第1520页。

⁷ 《变法平议》，《张謇全集》（4），第48页。

⁸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499页。

为普通小学堂，培养学堂教习，以及普通小学堂由江宁府两首县先行举办等具体兴学环节。¹四月，刘坤一复函沈曾植，告知江南拟设学堂“秋间方可开办”，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辅，是为一定不易之理，其余课程似不必刻舟胶柱”。²同时，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发表《教育私议》一文，从设学部分学区、定规则立章程、明等级循次第、编书籍、培养教员、补助奖励、派员游历留学、讲求体育卫生、兴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立图书馆及博物馆等十个方面提出建议。³五月，张謇、沈曾植、缪荃孙应邀赴武昌筹商新政奏稿，与张之洞“所谈甚多，惟小学校必可立。”⁴对此，报载：“现闻黄仲弢、叔庸昆季及张季直、缪小山诸词曹已先后应聘来鄂，从此学校振兴，人材蔚起，不难拭目俟之矣”。⁵同时，江鄂筹立译书局，聘请缪荃孙主持编译教科书，为此，张之洞函商刘坤一，有云：“前闻公请缪筱珊编纂小学堂教科书，鄙人亦面托。此事极好，待用甚急，望敦促之，嘱其两三个月编成为要。编成后尚须覆订详酌。此席作为江、楚共请，脩金各半分送。脩数若干，请酌定。”⁶五月二十七日，江楚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从“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⁷，“变法莫重于学校、科第”⁸的认识出发，在学制、课程、考试、选拔、游学、译书以及变通科举、停罢武举等方面提出较为系统、全面的建设规划和改革建议，其“所陈人人知为先务”⁹。随即，六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学务处，札委江苏特用道郑孝胥、湖北候补道赵滨彦为总办。规定学务处职能为：“所有关涉学务之章程、经费、委员衔名、学生人数、功课年限、时刻图表、考课题目，均须汇总，随时呈览，以备考核而覘进退。”¹⁰同时，作为兴学改制之先声，江鄂各书院“课艺改试策论，课程改习经史、算学、时务，则已一律奉行”。¹¹八月，清廷颁行兴学谕旨，推动江鄂加快落实兴学举措。报载：“两江总督刘峴帅默观时局，谓非令士人周知时务不可以言振兴，爰拟将各书院一律改为学堂，课诸生中外有用之学”。¹²九月，江宁方面正式成立译书局，指分湖北试用道、江南商务局总办刘世珩任总办，缪荃孙、张謇任总纂，开始编译包括小学堂课本在内的日文书籍，如《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九月九日）请茅春台理日本书，照单点四十九种，单有书无者十九种，书有单无者六十八种。”同时，承刘坤一之命，张謇、罗振玉、缪荃孙在江宁与官方代表恩寿、刘世珩、督府洋务文案施炳燮等第一次集议兴学事宜。对此次筹议兴学情况，据张謇、缪荃孙日记整理前后经过如下：

八月二十六日（10月8日），在通州忙于筹办垦牧公司事宜的张謇接“新宁（刘坤一）电，速去省”；¹³九月九日（10月20日），张謇至江宁文正书院，次日拜会恩寿。十一日（22日），张謇、缪荃孙、施炳燮、刘世珩先后在文正书院和缪家晤谈并电邀罗振玉赴宁，张謇

¹ 《复张季直》（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83页。

² 《复沈曾植》（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85页。

³ 罗振玉：《教育私议》，《教育世界》第1册，辛丑年四月上。

⁴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04页。

⁵ 《讲求学务》，《申报》第10159号，第2页。

⁶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张之洞全集》，第8636页。

⁷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第1406页。

⁸ 《复张香涛》（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90页。

⁹ 《复张香涛》（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90页。

¹⁰ 《札委学务处总办等》（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全集》，第4109页。

¹¹ 《复刘我山》（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303页。

¹² 《改设学堂》，《申报》第10226号，第2页。

¹³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08页。

“与缪艺风论学校尚近。主中宾外，不废诵读，是定向方针。”¹十三日（23日），张謇谒见刘坤一，缪荃孙、刘世珩代表译书局公请张謇、陈作霖、凤池书院山长秦际唐和曾任尊经书院山长、江南高等学堂总办的江苏候補道蒯光典。十四日（24日），缪、张、刘公请志钧、文廷式、陈伯陶、陈三立和江苏候補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等名流；张謇致函刘坤一，谈及罗振玉“译师范及中小学章程不日可全”及“课书审定属之仲弼”等事宜，后刘坤一复函称：“兹事体大，得公与诸贤相助为理，幸何如之！”²十七日（28日），江苏候補道、洋务局总办汪嘉棠招请尊经书院山长张仲炘和张謇、施炳燮、蒯光典、刘世珩等。十九日（30日），罗振玉到江宁，寓文正书院，此后至二十三日（11月3日），张謇、缪荃孙、罗振玉、刘世珩、施炳燮、恩寿等连日集议，其中张、缪、罗、刘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堂总教习藤田丰八提供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情况资料，“商订寻常、高等二级小学校、中等学校课程”。³廿四日（11月4日），张、罗附江轮东返。翌日，缪荃孙亦应张之洞电招赴武昌，领江楚编译书局总纂事。

那么，从张、缪有关记载，可以看到在前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江宁官方与有关士绅就办学方针、课程教材和如何改书院为学堂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讨。此次集议之后，一方面，作为集议之成果，光绪二十七年十一、十二月，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第十六、十七册上发表《拟订寻常小学校课程表》和《拟订高等小学校课程表》，在前言中罗氏认为：“今日中国兴学当修学政、定阶级、明纲要，既如前所说，而订定课程尤为要图。爰就日本文学士藤田剑峰（丰八）考求兹事，就中国中小学堂应授之学科拟订每年每星期之间之学科分配表，俾就各省取资焉。”⁴同时，罗振玉又撰写《学政私议》，分宗旨、职官、经费、学制、游学、学规、卫生、释务等八篇，对普兴学校教育再次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另一方面，缪荃孙在赴鄂途中拟《学堂条议》，到武昌后又进一步修订课表，并可能在谒见张之洞时禀报了有关集议和江宁准备兴办学堂的情况。十月十五日（11月26日）回宁后，缪氏即谒见恩寿、刘坤一交换情况，同时积极参与到改设书院为学堂的具体工作之中，与江苏候補道潘学祖等人连日至格致、惜阴、文正等书院勘地。

（二）第二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主要是在以江宁为中心筹办学堂的过程中对参照体系、兴学次第、师资培养、经费筹集等问题展开研讨并产生意见分歧。清廷兴学上谕颁行十天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1901年9月24日）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拟“先于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为之倡”，⁵大学堂内“分斋督课”，先开办备斋（略如小学）、正斋（略如中学），正斋学生毕业后设立专斋（略如大学）。八月二十四日（10月6日）清廷批准设立山东大学堂。十月十五日（11月25日）上谕要求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

¹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08页。

² 《刘坤一致张謇函》，《笈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6页。

³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09页。

⁴ 罗振玉：《拟订寻常小学校课程表》，《教育世界》第16册，辛丑年十一月下。

⁵ 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章程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1页。

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¹为此，江鄂恐“落山东之后”²，加快推进兴学进程。

首先，为全面了解新式学校教育的真实状况，从而为江鄂兴学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体系，一方面，刘坤一通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之助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寄送日本各类学校的组织大纲、制度、规则及细则、学校课程表”³的要求。另一方面，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1901年12月13日）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1902年2月19日），张之洞、刘坤一共同委派罗振玉率团赴日本调查教科书编译并考察教法、管学事宜。为此，九月三十日（11月10日）张之洞曾致函罗振玉，称：“连日与中弢、念劬谈编教科书，此教育根基，关系极重，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似非专特购来图书所能模仿。鄙人极注重于此，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如陈士可等，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全力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闻江南亦奉邀商酌，此事亟盼电复。”⁴作为清末首个官方奏派赴日进行的教育专题考察，罗振玉与两湖书院北监院刘洪烈、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孝全、田吴炤等在日本分赴各级各类学校参观，访谈日本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搜集日本教育制度、法令，购买教育书籍，兼及了解财政情况，并详加体察、记载。对此次考察，张之洞期望能给湖北兴学规划带来启迪，因而，他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3月）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电牍中称：“湖北前设学堂书院，虽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是以碍难奉复。拟俟赴东考察之员回鄂，详酌一妥章，再请奉达。”⁵考察团归国后，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社印行《扶桑两月记》、《教育赘言》，撰成《日本教育大旨》、《学制私议》，并且“首谒文襄（张之洞），文襄接见五次，囑于督署、学务处为幕府及各学堂提调、教习与守令演说教育事十日。所拟教育制度允商江督会奏。次谒忠诚（刘坤一），以卧病由幕府传语，亦深以所拟为然。”⁶

其次，落实兴办学堂的具体举措。一是建立筹办学堂机构。为“力图富强，锐行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1901年9月4日）刘坤一在江宁设立派办处，“专办各项新政事宜”⁷，以江宁布政使恩寿总其成，江安粮储道效曾、江南盐巡道徐树钧和军装局总办郭道直、洋务局总办汪嘉棠副之，⁸又添派潘学祖为会办，所以也称作“派办新政处”或江宁布政使江南派办处、江宁派办处，后又在苏州仿照设立“江苏布政使江苏派办处”。清廷兴学诏颁行之后，江南派办处亦奉命承担江宁学堂规划、经费筹集、派员游学等兴学事宜。江宁布政使恩寿、吴重熹先后领衔⁹，江安粮储道胡延、江南盐巡道徐树钧负责具体事务。十月卅日（12月10日）派办处颁学堂照会并学校章程草案，¹⁰由潘学祖、缪荃孙与河南候补道濮文暹、候选教谕陈作霖等负责勘校地、拟章程、订课程等具体事务。至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¹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13页。

² 《致缪荃孙函》（十七），《张謇全集》（3），第1653页。

³ [美]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第92页。

⁴ 《致上海罗叔芸》，《张之洞全集》，第8642页。

⁵ 《致京张治秋尚书》，《张之洞全集》，第8743~8744页。

⁶ 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2页。

⁷ 《办行新政》，《申报》第10204号，第2页。

⁸ 《派办章程》，《申报》第10221号，第2页。

⁹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恩寿擢升为漕运总督，吴重熹继任江宁布政使。

¹⁰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第1394页。

(1903年1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正式成立两江学务处,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委江安粮储道胡砚荪(延)观察为学务处总办,而以银元局志仲鲁(钧)观察和陆师学堂俞恪士(明震)观察副之。”¹

二是筹设学堂系统。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1901年12月),刘坤一、恩寿通过督署幕府、江南派办处与缪荃孙、张謇等士绅,依据《江楚会奏》折稿、张謇《变法平议》、罗振玉《学校政纲》(《学政私议》)、夏偕复《学校刍议》等文本,结合《试办山东大学堂章程》,对如何兴办学堂、构建学校教育体系等进行了研究与协商,并认为山东以省会大学堂统领、兼容中小学的速成兴学方式不利于国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张謇在致缪荃孙函中曾评论说:“山东学章实不在行,……若堂堂正正举办学校,不当踵行之也。”²故此,计划以江宁为中心,改书院为学堂,建立从小学、中学到专门学堂、高等学堂的国民教育示范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延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所奏“就江宁省城先行开办,以期迅速集事”,“拟将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³的基本思路,光绪二十七年十月至十二月(1901年11月至1902年1月)商定江宁原有各书院裁留的同时,议改各级各类学堂。张謇建议“留尊经课策论”,“格致即实业(二处各科均分班),惜阴即高等师范,钟山即寻常中学校,文正即寻常高等小学校(分班教授)”⁴。但新旧更替之际,致力于科举仕途的诸生“求留书院”⁵或“禀改书院之名,存书院之实”,⁶意见杂糅,风气未改。为此,刘坤一一度曾要求在金陵大小各书院中“以其半改为学堂,而酌留其半,令二十五岁以外举贡生监弦诵其中”。十一月,派办处核定“以惜阴、凤池两书院为小学堂,钟山、文正两书院为中学堂,尊经书院略改旧制,革除八股试帖,……俾限于年岁不得入学堂者亦得讲求有用之学”,“省学堂先就格致书院隙地添造学舍,扩而充之”。⁷十二月,又调整兴学规划,“拟将文正书院改为上江两县小学堂,钟山书院改为江宁中学堂,另于格致书院余地建造学堂一区,为江宁省高等学堂,并将尊经、凤池二书院改为校士馆”,同时派委潘学祖“总办学堂事务”。⁸潘氏又提出“改惜阴书院为大学堂,改钟山、文正两书院为中学堂,改奎光书院及崇文、景贤、鹞峰三官塾为小学堂”的方案。⁹

三是研究兴学次第。为落实兴学事宜,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1901年12月29日),刘坤一“招囑办学堂事”,命督署施炳燮、派办处潘学祖会同缪荃孙、张謇等协商。施氏“忧办理失序,令人讪笑”¹⁰,主张依据罗振玉《学政私议》所论,明确兴学次第,循序创设学堂;缪、潘等则以“恐阻新宁之兴,落山东之后”¹¹为由,主张各级学堂并建。双方各执己见,产生意见分歧。为此,刘坤一致电张謇,“以省府县学校并建,与先建中小小学师

¹ 《振兴学务》,《申报》第10699号,第2页。

² 《张謇全集》(3),第1656页。

³ 《创立江省郡县学堂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3922、3924页。

⁴ 《致缪荃孙函》(九、十七),《张謇全集》(3),第1653、1656页。

⁵ 《艺风老人日记》,第1424页。

⁶ 《致缪荃孙函》(九、十七),《张謇全集》(3),第1653、1656页。

⁷ 《制军造士》,《申报》第10316号,第3页。

⁸ 《札办学堂》,《申报》第10353号,第3页。

⁹ 《白下官场纪事》,《申报》第10354号,第2页。

¹⁰ 《致缪荃孙函》(十八),《张謇全集》(3),第1657页。

¹¹ 《致缪荃孙函》(八),《张謇全集》(3),第1653页。

范二说未定，属即诣省商订”。¹但张氏在家乡赶办通海垦牧公司筑堤工程，回禀“非二月初不能”赴宁，²并与缪荃孙往复函商。在信函中，张謇一是意欲调和缪、施分歧；二是再三强调：为审慎起见，应待奉命赴日考察学务的罗振玉回国后“再定学校”，³认为“叔韞不久当归，必能为公辅助”；⁴三是认同罗振玉意见，强调“事固有序，与其尽做补习功夫，不若以中学先做补习，后做豫备工夫，且师范不立，不特教法不齐，即管理法亦无从取，则恐非计之得也。”⁵对此，缪氏日记中有云：“得季直信，仍以罗、施为是，学堂不得成矣！”⁶乃至十二月廿四日（1902年2月2日）“上恩中丞信，有言学堂开不成，甚为愤愤”。⁷为此，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1902年2月23日）刘坤一请刘世珩带手书给缪荃孙，要求兴学事宜待罗、张至宁集议后再定。二月初二日（3月11日），清政府认为地方督抚兴学不力，奏报不详，再次谕令各省“妥速筹画，实力奉行，即将开办情形详细具奏”，并指示“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为此，二月十八日（3月27日），张謇再“得新宁促去宁之电”。⁸十九日（28日），罗振玉由武昌抵达江宁，当晚函禀其父罗树勋说：“学务一切顺手……两帅虚衷以听，颇可敬佩。须在此数日，待季直来商议奏稿，然后携至沪上，三月中旬，黄仲弢学士由鸥到沪，再与商酌，由仲弢携之到鄂，便可奏出。”⁹二月二十七日（4月5日），张謇“至江宁，住利涉桥西侧傅河厅”，¹⁰此后至三月七日（4月14日）前后10天，官绅之间第二次集议兴学。以下据张謇、缪荃孙日记梳理集议经过如下：

二月十九日（3月28日）至二月廿六日（4月4日），罗振玉至宁后，缪、罗先后三次长谈，并先后参加刘世珩和指省分发道傅春官组织的宴请，与潘学祖、淮安知府徐乃昌、译书局委员宗嘉禄同席。同时，吴重熹交缪氏“中小学堂图样、物像”，缪氏将所编《普通学歌便注》、《礼书初编》、《江宁地輿略》等课本呈送刘坤一。¹¹

二月廿七日（4月5日），张謇至江宁，与罗振玉、缪荃孙及湖北自强学堂教习陈毅等晤谈。

二月廿八日（4月6日），张謇、罗振玉谒见派办处吴重熹、胡延、徐树钧，“论学务，异议锋起，一司二道，或昏、或钝、或滑尼之”。¹²

二月廿九日（4月7日），张謇、罗振玉谒见刘坤一，“定先立师范中小学议”，“议上，新宁甚韪之。”¹³是日张、罗、缪再次聚谈学务，刘世珩在傅河所宴请张、罗、缪、潘学祖、徐乃昌和派办处提调孙诒嵩、委员黄麻民等。

三月朔（4月8日），对张、罗向刘坤一提出的兴学建议，衙参之时“司道同词以阻。胡道言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过信罗叔韞，叔韞过信东人之过

¹ 《致缪荃孙函》（九），《张謇全集》（3），第1653页。

² 《致缪荃孙函》（十四），《张謇全集》（3），第1655页。

³ 《致缪荃孙函》（九），《张謇全集》（3），第1653页。

⁴ 《致缪荃孙函》（十八），《张謇全集》（3），第1657页。

⁵ 《致缪荃孙函》（八），《张謇全集》（3），第1653页。

⁶ 《艺风老人日记》，第1422页。

⁷ 《艺风老人日记》，第1426页。

⁸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6页。

⁹ 罗继祖著：《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43页。

¹⁰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¹¹ 《艺风老人日记》，第1444~1446页。

¹²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¹³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也。吴藩司亦赞之。新宁复语我，此事难办，叹息不已。”¹潘学祖与郭道直合请张謇、罗振玉、缪荃孙、刘世珩、陈作霖、徐乃昌、秦际唐等人。

三月二日至四日（4月9日至11日）张、罗拟“兴学条程”呈督府，并代刘坤一草拟《学制奏略》文稿，其所依据的则即是后来罗振玉在《教育世界》上刊载的《日本教育大旨》和《学制私议》等文本。期间，缪荃孙连日至傅河所与张、罗、徐乃昌等“夜谈学堂事”，缪氏认为张、罗所议“愈离愈远，更无生矣”，即使“委屈迁就，尚未知能成否也？”同时，徐乃昌、汪嘉棠、江苏候补道马声焕和督标护军统领、福山镇总兵杨镜岩等亦先后招饮，士绅藉此集议兴学事宜。²

三月五日（4月12日）罗振玉离宁赴沪。张謇与缪荃孙“定办高等师范议”，文稿由张謇手草并送呈刘坤一。³

三月六日（4月13日）张謇“同缪公、黄麻明相度惜阴书院，拟改为两县小学校”。⁴

三月七日（4月14日），张謇附“江永”轮返沪。九日（16日）吴重熹、胡延、徐树钧和郭道直至缪荃孙处再次商议兴办学堂事宜，缪氏认为：“诸事无成，一闕而已”。⁵

据上所述，江宁第二次兴学集议的目的有二：一是讨论学校系统即学制问题，并拟由江楚会奏；二是商定在江宁兴办学堂的具体问题。但在是否参照、仿行日本近代教育体系和兴学次第的问题上产生激烈辩争和严重分歧，最终官绅不欢而散，尤其张謇、罗振玉大受刺激。罗振玉曾向沈曾植诉说因此而生的委屈愤懑之情，他说“玉在南中，亦借校书闭户，寥落之情，不言可喻”，“承示东西之争甚烈，此必然之势，玉不欲持炬救焚，故宁默默，长者以为如何？”⁶为此，沈氏复函劝慰说：“南皮、新宁皆倾心，多口何畏，公遽结舌，所不解矣！”⁷或许，沈氏没有亲历集议过程，尚未能理解张、罗当时势单力孤、有口难辩的处境。

（三）第三次集议

兴学集议的第三个阶段是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到十月（1902年10月），主要是江鄂按“江宁兴学之议”的共识，各自开办各级各类学堂，其集议分歧和张、罗主张则通过张之洞“湖北学制”的出台得以消解、汇融。其间大致经过、情形如下：

第二次集议之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4月21日），张謇与罗振玉在上海“谈自立师范学校之事”，回家乡通州后即“拟自立寻常师范学校”，⁸同时“仍劝新宁立高等师范”。⁹三月下旬，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刊载其《学制私议》，并与由温州回武昌道经上海的黄绍箕合议兴学之事，《学制私议》及代拟《学制奏略》稿本由黄绍箕转呈张之洞。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5月1日至2日），黄绍箕至江宁与缪荃孙、吴重熹、刘世珩、濮文暹、徐乃昌、陈善余、易顺鼎、王仁东等江宁官绅交换意见，缪荃孙交带编译课本呈张之洞。二十八日（5日），张謇致函赵凤昌询问情况，有云：“仲弢与叔蕴议合否？抱冰意又若何？新宁答书希转

¹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² 《艺风老人日记》，第1448页。

³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艺风老人日记》，第1449页。

⁴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⁵ 《艺风老人日记》，第1450页。

⁶ 《罗振玉与沈曾植书》，《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6页。

⁷ 《与罗振玉书》，《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4页。

⁸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8页。

⁹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8），第1018页。

致时薰兄。”¹四月朔（5月8日），刘坤一致函张之洞，称：“张季直殿撰来宁，与筱珊、叔蕴面商学制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开具条例，由江鄂会奏，并云办高等师范学堂更可为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治弟因事属创始，请其代拟折稿，而此间议论不无参差。谨将条例、奏稿并钞呈核，以期折衷一是，即请迅赐裁覆是禱。”²四月初七日（5月14日），经过精心酝酿，参照包括罗振玉、张謇在内的士绅意见，张之洞在湖北扩充学务处，“改设文、武大中小各学堂，并添建师范学堂、方言学堂、仕学院、教士馆等所”，³全面推行教育改革，创设学校体系。四月初八日（5月15日），刘坤一会同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学政李殿林上《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报称：“文正书院改设小学堂一所，聘候选教谕陈作霖为总教习，课上元、江宁两县人士，习初级浅近之学；钟山书院改设中学堂一所，聘河南候补道濮文暹为总教习，课江宁府属人士，习普通之学；……至高等学堂……聘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教习；其尊经、凤池两书院改为校士馆”。同时“另设师范学堂”，“江楚会设编译书局，一俟成有课本咨送京师大学堂核定颁行。”⁴对此，张謇甚为不满，认为“省中学务之奏，似高等师范四字分读，而非连续，不知以此敷衍，政府抑果如此也。”⁵此后，江宁方面，以胡延为总办，缪荃孙“领高等、中、小三堂事”，积极推进建筑校舍、商定章程、拟制课程、订购器械、延聘教习等兴学事宜。八月，派办处“经相度，得城内北极阁南空基，堪以建造江南省学堂，惟购地庀材尚需时日，奉准督以钟山书院改建之府学堂借作高等省学堂，文正书院改建之县学堂借作府学堂，其县学堂暂将惜阴书院改建，委员勘估，督匠开工，统限八月内完竣”，并定高等学堂于九月招考学生。⁶湖北方面，至十月初一日（10月31日），在湖北学堂筹定规模、分投兴办、汲汲经营的基础上，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确“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⁷并奏明各学堂办法十五条、筹办学堂要旨八条。其奏折内容较全面地规划了学校教育体系，是所谓“湖北学制”，同时也是对“江宁兴学”之议的一个结论性总结。

湖北学制颁行之时，因九月（10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十月六日（11月5日）莅宁接篆后，张之洞“住高等学堂作行辕，遂缓开高等学，先开中小学堂，”⁸并决定“改江南高等学堂为宁属师范学堂外，另设三江师范学堂一所”，⁹三江师范学堂为高等师范学堂，实际上是采纳了第二次集议时张謇、罗振玉的兴学建议。为此，张之洞特邀罗振玉、张謇及如皋在籍翰林院编修沙元炳再次“往议学校”。¹⁰张謇、沙元炳于十一日（10日）至宁，罗振玉十四日（13日）到，遂成官绅第三次江宁兴学集议。期间，八日（7日）张之洞招缪荃孙入署，与黄绍箕一起“谈学务甚多”；十一日（10日），张謇、沙元炳、

¹ 《致赵凤昌函》，《张謇全集》（2），第122页。《全集》将系年“光绪二十八年”误注为“光绪二十九年”。

² 《致张香涛》（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311~7312页。

³ 《札委黄绍第充学务处总办》，《张之洞全集》，第4186页。

⁴ 《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5026~5027页。

⁵ 《致徐积馀函》（四），《张謇全集》（3），第1636页。

⁶ 《学堂招考》，《申报》第10576号，第2页。

⁷ 《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之洞全集》，第1488~1489页。

⁸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艺风老人日记》，第3406页。

⁹ 《师范须知》，《申报》第10668号，第2页。

¹⁰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8），第1019页。

徐乃昌至缪荃孙处“改定师范学堂课程”；¹十三日（12日），张謇、沙元炳考察了由文正书院改建的江宁府中学堂，认为“一切不中程度”²；此后，张謇、缪荃孙、罗振玉与黄绍箕、徐乃昌、刘世珩、沙元炳、陈三立、俞明震、沈瑜庆、王仁东等连日集议；二十日（19日），张謇“晤南皮，说学事”，³翌日附轮返里。至此，集议分歧基本得以调和解决，“湖北学制”也在江宁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得以延展、落实。

三、江宁兴学过程中的意见分歧

江宁集议兴学是江鄂官绅循朝廷谕旨明诏之势展开的一种地域互动和合作交流，其兴学共识是基础，他们共同期望“宗旨既明，风气自转，以后士子皆知讲求经济以成有用之才”。⁴但在“科举未停，民智未启，”⁵“官民不知学校之果为何物”⁶的过渡时代，在如何兴学的具体问题上又必然产生激烈争鸣，其间分歧有如罗振玉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复沈曾植函中所言：“长者询前者在江宁时所议学务，其中原因甚长，殊不欲说，请言其概，则制军无力气，司道颇阻碍，绅士多议论、逞意见而已。”⁷就督抚而言，刘坤一“大事不糊涂”、“一生唯谨慎”⁸是其一贯作风，其时又年届七十三四，自称“年衰多病，近益委顿不堪”，⁹所以张謇在戊戌时即有评价说：“师丹老而忘矣”¹⁰。那么，在兴学问题上主见不足，囿于议论分歧，举棋不定是显而易见的。对张之洞，张謇曾评价说：“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¹¹但在赴武昌谒谈新政之后，张謇又曾致函徐乃昌说：“此老新政极著精神，唯近来新书少见，所言尚不无隔膜之处。”¹²对于江宁司道，如吴重熹、胡延、徐树钧等，张謇认为是“不闻政声”、“特长于说碑版”、不啻新政西学的传统旧学官僚，对此张之洞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肯办事便难得，湖北无此人”。¹³而且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在江宁曾发生过一起吴重熹的亲兵毆伤陆师学堂教习黄子和、夏仁虎的恶性事件，事情发生后吴氏欲袒护亲兵，重惩教习，招致士议，尤其新知人士愤愤不平，通过《申报》等媒体连日发表抨击性报道和评论，并认为“凡为宦途中人当以此为殷鉴，亦地方之福也”。¹⁴至于士绅，当时普遍情况是“学子仍守旧习”¹⁵，即如倡议兴学的沈曾植、缪荃孙等亦尚有“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¹⁶的短识。因此，随着集议深入具体、兴学切近落实，官绅之间意见相左实乃不可避免。归纳起来，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价值取向之争。当代学者在研究清末“新政”时指出：“作为‘新政大端’的学堂，

¹ 《艺风老人日记》，第1509页。

²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28页。

³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28页。

⁴ 《复沈子培》（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286页。

⁵ 《南通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序》，《张謇全集》（6），第371页。

⁶ 西谷虎二：《题南通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后》，《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二期，翰墨林印书局，民国元年四月印。

⁷ 《罗振玉与沈曾植书》，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76页。

⁸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26页。

⁹ 《复王爵棠》，《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2283页。

¹⁰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443页。

¹¹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428页。

¹² 《致徐积馀函》，《张謇全集》（3），第116页。

¹³ 《致徐积馀函》，《张謇全集》（3），第116页。

¹⁴ 《论教习被辱事》，《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四日。

¹⁵ 《复李务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刘忠诚公（坤一）遗集》，第7300页。

¹⁶ 《与丁立钧书》，《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47页。

一旦办起，就不得不讲求西学，于是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又成为方针上的重大争议。”¹清政府从为维系王朝统治而培育人才的政治要求出发，提出兴学目的首在“正人心”，次则“开民智”，特别强调“尊德性、道问学二者不可偏废”，²“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³这在地方“书院改学堂”的实施过程中造成了机械执行、注重形式、简单拼凑的办学误区。许多地方官员，包括江宁的“一司二道”，一方面视办学为政绩，所谓：“疆吏之办学堂也，不过藉此以聊博维新之名誉，逃外人之议论，且可以多安置私之所。”⁴另一方面，他们对学校和西学的认识十分简单、片面，如张之洞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电牍中曾批评说：“近年言西学者，多只注重方言、算学两门，似非外国教育宗旨”。由此，在兴学过程中他们对系统引进包括学制、课程、师资在内的西方教育体系并不重视，乃至颇有抵触。对此，张謇曾一再提醒缪荃孙说：“政务处于学校事全无主见，止是扶墙摸壁”，⁵“幕府无人，事事将求合于国，……派办处无人，将来公事之榘枘缪戾，恐不止一端也”。⁶在江宁议学过程中，新知人士和开明官僚主张兴学之初先要统一思想认识，引进西方教育，所谓：“通理想于众人意识之中，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⁷所以，一方面，他们立足于救亡图强、智民兴邦的理想，倡导普及国民教育，所谓“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之教育”。⁸罗振玉在《学制私议》中提出“守教育普及之主义”，规划建立国民教育体系，即“先教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之基础及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即小学教育），驯而进之以高等普通教育（即中等教育），再进之以国家必要之学术技能之理论与精奥（即大学教育），循序渐进，勿紊其序。”并且建议仿行日本“定小学前四年为义务教育”。⁹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日本与我国同洲、同文、同种，改良学制在我之先”，¹⁰所以“求师莫若日本”。¹¹罗振玉认为“教育一事，当全国画一，故以颁教育制度为第一要务，日本兴学之初，即深明此理”，“今日本全国一切学校皆本之学校令，……此中国亟当法效者”，进而倡言从日本全面引进包括教育宗旨、方针、学制、课程、管理机构、师资培养等在内的近代教育体系，所谓“今宜采用日本之制，相宜变通之”。¹²新知人士的兴学主张摒弃了传统的人才教育，即所谓“勿存培植人才之见”，¹³更形成“以西用的规矩尺度来衡量规范中体”¹⁴的价值趋向，必然会动摇传统文化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因而，早在张謇撰呈《变法平议》之时，刘坤一即以张氏主张“大抵心醉日本，凡事皆欲仿而行之”，而“未愜于心，不加可否”。¹⁵在集议时，张、罗的仿日主张更受到江宁学务官员的强烈抵制，连缪荃孙也指摘说：“守旧而不知变易，

¹ 丁伟志、陈崧著：《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305页。

² 《山西学务处所定学堂章程》，《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

³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76页。

⁴ 杜士珍：《学生潮》，《新世界学报》第12期。

⁵ 《致缪荃孙函》（十七），《张謇全集》（3），第1656页。

⁶ 《致缪荃孙函》（十八），《张謇全集》（3），第1657页。

⁷ 《通州师范学校议》，《张謇全集》（4），第66~67页。

⁸ 《通州师范学校议》，《张謇全集》（4），第62~63页。

⁹ 罗振玉：《学制私议》，《教育世界》第24册，壬寅年三月下。

¹⁰ 《开学与教习监理致词》，《张謇全集》（4），第69页。

¹¹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第1版，第40页。

¹² 罗振玉：《教育私议》，《教育世界》第21册，壬寅二月上。

¹³ 《张元济年谱》，第42页。

¹⁴ 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第3期，第91页。

¹⁵ 《白下官场纪事》，《申报》第10102号，第3页。

迂儒固无以通方；知新而舍其本，图华士更无以致用。”¹但是，新知人士的主张却得到了张之洞、张百熙的支持。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张百熙通过盛宣怀、沈曾植邀请罗振玉赴京参与大学堂创办译书院事宜；五月（6月），奏派京师大学堂总办吴汝纶率团赴日本考察，九月（10月）吴汝纶回到上海，张謇、罗振玉、汤寿潜等与之聚谈，并观看其《东游丛录》稿本，而这本考察记在出版后，“对清末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²十二月（1903年1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缪荃孙赴日考察学务。同时，随着湖北学制和壬寅、癸卯学制的出台，晚清教育改革的仿行日本普及国民教育的策略最终确立起来。当然，对于教育的仿日风潮和“东学”取向，也有不少新知人士持批评的态度。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1月）给弟子的信中曾说：“今日天下汹汹，皆持东学，日本人相助以扇其焰。顷赵仲宣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以主西学宗旨与人异同，几为人人所欲杀，顷已自劾去矣。罗、吴倡之于南，张、李持之于北，而长沙、南皮为之护法。……往者高丽之事起于东学，中国为之续也。”³而随着办学实践的深入和对教育认识的提升，张謇后来在致沈曾植的信中也承认“叔蕴不无偏信东人，此亦一弊。”⁴

二是兴学次第之争。兴学诏颁行之后，清政府以“亟亟乎求成”的心态连颁上谕督促各省兴办学堂，提出“通省学堂同时举办，财力或有不逮，若必待各府厅州县中小学堂帑足始行开办，转致观望迟延”，要求按国家先立京师大学堂的思路，在全国推广山东在省城创设“大学堂兼包中小两学堂”的兴学模式，同时京师和各省大学堂又分别作为全国和各省的学务管理机构。此后内地十八省除云南外均先后奏报筹立通省大学堂，漕运总督和江苏、陕西学政还奏请设立江北大学堂、南菁高等学堂和宏道大学堂。这些大学堂除甘肃拟“分设东西两斋，东考文学，西讲武备”⁵之外，均仿山东分设备斋、正斋或专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四省还拟在省城分设通省中学堂和小学堂。山东兴学模式的本意：一是在于速成，快速培养中西学兼赅的辅治人才；二是在于示范，为府厅州县设立中小学提供样板。然而，这一模式明显有悖于学校教育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导致大学办不好，即如吴汝纶评论所说：“各省均称大学堂，其程度尚不及外国小学，名不副实，甚属无谓。”⁶另一方面有碍于中小学的普及。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教育政策私议》一文批评说：“顷者朝廷之所诏敕，督抚之所陈奏，莫不有州县小学、府中学、省大学、京师大学之议，而小学中学至今未见设施，惟以京师大学堂之成立闻，各省大学堂之计划亦纷纷起；若循此以往，吾决其更越十年而卒无成效者也”；“至于小学，今论者亦知其急；……而今当事者，只欲凭口舌劝说，使民间自立之而已。……且吾恐十年以后，而举国之小学犹如星辰也。”⁷对此，张謇、罗振玉等从普及国民教育，“使少数之人民受高等之教育，无宁使多数之人民受寻常之教育”的立场，

¹ 《艺风老人日记》，第1441页。

² 《题解》，《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5页。

³ 严复：《与熊季廉书（八）》，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37页。

⁴ 《致沈曾植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张謇全集》（2），第141页。

⁵ 《陕甘总督崧制军奏陈甘省筹设大学堂事宜折》，《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⁶ 吴汝纶：《答方伦叔》（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9月第1版，第410页。

⁷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65~166页。

提出“教育一事贵明秩序”的兴学原则，¹认为将来的正当办法是：“先立师范学校，一年后各州县分别立高等、寻常小学校，三年后各府立中等学校。其各省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之大学校，五年后置焉”。²但普及教育时不我待，其变通办法是：“先设速成师范科，一年内可得小学教员。中等及专门之学校亦与小学校同时并立，而先立补习科，补习普通学一年”，³而“至大学校则稍待再图之”。⁴基于以上认识，他们主张缓建刘坤一和学务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江南高等学堂，先立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尤其是应首先创办师范学堂，因为他们认识到“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⁵对于培养教员，山东、湖南、湖北、贵州、直隶等省在筹划兴学时均有不同举措，其中山东、贵州拟于大学堂内“参用初等师范学堂规制，在备斋各班学生内，择其心术端正者，兼令练习初等师范”，将来“承充小学堂教习”；“入正斋肄业者，届时参用中等师范学堂规则，再令练习中等师范，以备中学堂教习之选”。⁶但这种在相当于小学的备斋培养小学教员和相当于中学的正斋培养中学教员的方法在教育逻辑上明显存在问题，因此袁世凯迁署直隶总督后也奏拟在保定创设直隶师范学堂。湖南则首先提出派人出洋游学的办法：“遴派大挑知县胡珍，偕同善化举人俞浩庆等十一人，前往日本游学数月，专考求教育方法，归备教员之用。”⁷张之洞也曾向张百熙建议“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⁸但此举仅备一时之需，很快出现各州县“以教习乏人纷纷稟请选派，骤无以应”⁹的局面，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湖南奏设师范馆。江宁方面，光绪二十七年岁末，署理镇常通海关道陶森甲曾向刘坤一提出向日本派遣学生学习师范，建议“就东南各省选择品学兼优、关心教化者六十人，送日本师范学校，定一急救课程专班，教育限六月，习其至要学科、等级，心通其意，在令游历外府县两月，考求中小学校颁发，分起回省，就各本省设一师范传习所，约该省之通人达士讲求讨论次第，派令掌教各学堂，必能舍旧从新，恢复教泽。”¹⁰这一建议与湖南的做法相似，但似乎并未引起刘坤一的重视。就张謇、罗振玉而言，在参与兴学筹议前后他们即已关注师资培养，罗振玉在这一时期发表教育见解时几乎都把创立师范学堂培养教员作为兴学的最重要举措，建议师范讲习科、速成科和本科三项并举，并且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专门撰写《设师范急救科议》，就定校地、招学生、定学期、定学科、选课书、聘教习、行考试、购图书、定年限等十方面提出系统的建议。兴学集议之时，张、罗二人为折衷官绅意见，提出融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于一体，创设高等师范学堂，并由张謇起草《师范学堂条例》，提出招收高等科三十人、寻常科三十人、速成科四十人、讲习科六十人，共额定一百六十名；第一年聘东人卒师范业者二人，各科教习应聘中文六人、东文六人等具体规划。¹¹然而，由于主张学制仿行

¹ 罗振玉：《学政私议》。

² 《通州师范学校议》，《张謇全集》（4），第62~63页。

³ 罗振玉：《教育赘言八则》，《教育世界》，壬寅年二月上。

⁴ 罗振玉：《学制私议》，《教育世界》第24册，壬寅年三月下。

⁵ 《师范学校开校演说》，《张謇全集》（4），第70页。

⁶ 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5页。

⁷ 俞廉三：《奏为遵旨改设学堂并派人出洋游学筹办情形折》，《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岳麓书社2010年9月第1版，第292页。

⁸ 《致京张治秋尚书》，《张之洞全集》，第8744页。

⁹ 俞廉三：《奏为遵设师范馆并续派出洋留学各情形折》，《晚清湖南新政奏折章程选编》，第300页。

¹⁰ 陶森甲：《派遣学生学习师范稟》，《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影印版，第397页。

¹¹ 《艺风老人日记》，第1533~1534页。

日本、师范聘请日籍教习，张謇、罗振玉的提议遭到派办处学务官员的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此左右为难，一方面就“高等学堂及师范为一为二”¹再次下有司讨论，一方面请张之洞裁夺。后来作为折衷意见，在向清政府奏报江南兴办学堂情形时提出在设立高等学堂和中、小学堂的同时另立师范学堂。但直至刘坤一去世，江宁官方并没有任何筹建师范学堂的具体举措。为此，张謇在罗振玉、汤寿潜、王国维和日籍教师木造高俊的协助下，通过自己出资、乡绅捐款和实业拨助方式，在家乡通州创设私立师范学校。后来，张謇在光绪二十八年二月的日记中还专门补记了一段话，他说：“乃谋自立师范学校，计所储任办纱厂以来，不用之公费，五年本息环生可及二万元，加以劝集，或可成也。后之人知中国师范之自通州始，必不知自二道一司激成之也。”²张、罗的兴学建议在湖北方面却被融入兴学规划，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张之洞任命梁鼎芬等筹办师范学堂，十月在奏报“湖北学制”时定“师范学第一”，确立起“首重师范”的兴学次第原则。同时，张之洞移督两江之后，首先决定“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³创建起面向两江辖域三省、兼包寻常、高等两级、学额高达900名的三江师范学堂，并且邀张謇、罗振玉等到江宁再次与缪荃孙、黄绍箕等商议章程、课程等事宜。至此，张、罗的建议在江宁的兴学规划和实施中全然被采纳，江宁兴学之议亦藉此一锤定音。

四、结语

“江宁兴学”之议通过江鄂官绅间往复筹议，逐步明晰和统一了对学制、办学宗旨和学校科目、学级、课程设置的认识与规范，并以江宁为中心探索建立起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大师范学堂的地方示范性学校教育体系。至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10月），两江总督魏光燾《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开办情况进行了统计，“通查现已办各处，计省城高等、专门学堂凡七所：曰三江师范学堂，曰高等学堂，曰农工实业学堂，曰水师学堂，曰陆师学堂，曰将备学堂，曰江宁师范学堂；各府厅州县中、小、蒙学堂凡九十一所，内江宁、徐州、扬州、海州等处中学堂四所，宁、淮、扬、徐、海、通所辖各属小学堂二十四所，蒙养学堂二十三所，又通州国立师范学堂一所，统计省城及各府署学堂凡九十九所”。⁴由此，既直接推动了今天江苏地域近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开启，又为湖北学制的酝酿和出台提供了智力支撑。当时其他省份也多有参考江鄂兴学经验者，如江西巡抚曾委派人员“前往金陵摹绘大中小各学堂图样并咨取一切章程及读本、课本，以便仿照办理”；⁵陕甘总督则请湖北“代延西学教习二三人，带购切要时务书籍数十种”。⁶而随着1903年张之洞应诏晋京会同荣庆、张百熙制定癸卯学制，江宁议学的相关成果更融入了全国性的教育政策之中。

江鄂筹议兴学前后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说明作为清末新政的实际设计者张之洞、刘坤一对地方兴学的重视和对教育决策审慎，所以按当时各督抚（含漕运总督）奏呈兴学情形折的先后时间顺序统计，刘坤一是第十六位，张之洞则是最后一位。而较为充分的研讨、争鸣

¹ 《艺风老人日记》，第1451页。

² 《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8），第517页。

³ 《创建三江师范学堂折》，《张之洞全集》，第1527页。

⁴ 《江督魏午帅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申报》第11310号，第1页。

⁵ 《江西省垣大学堂将次开办》，《申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廿日。

⁶ 《陕甘总督奏呈甘省筹设大学堂》，《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也决定了晚清时期江苏、湖北教育发展的一些特色，如较其他省份，两省办学的规范性、系统性更强，尤其是士绅成为推动兴学的重要力量。缪荃孙、罗振玉、张謇作为士绅的代表不仅参与议学，更直接从事办学实践。其中，缪荃孙于1902年至1907年间被任命为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监督和三江（两江）师范学堂总稽查，并参与江宁中、小学的创建工作，为江宁示范性学校教育体系的构架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振玉在江宁第二次兴学集议后至辛亥革命爆发期间，先后应邀担任南洋公学东文科监督、两粤教育顾问、江苏教育顾问、江苏师范学堂监督；1906年奉调学部，受委视察各省学务，任考试襄校官、参事官；1909年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张謇此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通州按“立之有本”、“行之有方”、“次第有序”¹的办学方针，依托地方实业体系，建立起从小学、中学到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和大学的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进而参与三江师范学堂、复旦公学、暨南学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建设，并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会长，积极推动江苏乃至全国教育的规划与发展。作为与教育相始终的近代著名教育家，张謇在晚年曾总结说：“万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无卒之事也；万物有新者有旧，教育有新而无旧之事也。”

²

作者简介：都榭，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3—180页。]

¹ 《南通师范学校十年度支略序》，《张謇全集》（6），第371页。

² 《南通教育年鉴序》，《张謇全集》（6），第612页。